

俞晚群 著

▼ 浙江大学出版社

那一張奮書單



那一张旧书单

俞晓群 著


浙江大學出版社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那一张旧书单/俞晓群著.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4.1

ISBN 978-7-308-12704-2

I. ①那… II. ①俞…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306312号

那一张旧书单

俞晓群 著

责任编辑 周红聪

营销编辑 李嘉慧

装帧设计 吴光前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148号 邮政编码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mm × 1240mm 1/32

印 张 5.75

字 数 117千

版 印 次 2014年1月第1版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2704-2

定 价 43.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联系方式: (0571) 88925591; <http://zjdxcbbs.tmall.com>

序：“穿帮”的愉悦

沈昌文

退休以还，常爱读关于江湖的书，由此联想“出版江湖”的种种。讲正儿八经的出版、传媒之道的讲义教材，到这时已经不想去钻研了，只有了解和回忆一下自己在“出版江湖”方面的经历，还觉得有点意思。

我同江湖之道渊源颇深。十六七岁当小学徒时，常常伺候一些地下的共产党员。他们到上海来采购物品，同种种人物接触，在台面上讲的，都是江湖套话。可往往是话里有话，有深意存焉。我记得，当时那位领导人虞天石，私底下看他忙于研读古典诗词歌赋，可一到场面上，立即表现为十足的生意人，尽说些庸俗不堪的生意经。我由此懂得，做人所以要有两副面孔，有时实在出于需要，并不是存心要做什么“两面派”。那时还有一个共产党员，天天同一些“白相人”打桥牌，可我看他深夜还在床上细心研读一本英文的桥牌手册，方知他白天在桌上嚷嚷的什么“diamond”、“spade”……都无非是刚从书上看来的应对之道。

五十年代以后，自己一心学做正道的革命出版工作，不敢旁骛。可到了八九十年代以后，就一心扑到出版江湖上了。现在晓群兄所

记我的种种，大概不少属于我们一伙儿的江湖行为，包括正面的、积极的和消极的。当然，他出于善意，不会写我的江湖劣迹。记得有位大学者，曾经专门为文揭发我的江湖劣迹。可惜他调查研究不够，所举种种，不免大多不符实际。但他最后说：“我惟希望昌文宁可越老越糊涂，不要变得越老越不要脸！”这话我还经常念叨。其实，我同这位老兄结交，还真出于一个不要脸的江湖劣迹：他答应一家出版社出一套书，条件不够好，订了合同后还要我去抢过来，由我来出，多给他一些钱。我稍使江湖小技，一抢到手。可惜，这“小技”后来却为一位老翻译家吴劳老兄发现，他在一公开场合把我大大羞辱一番。我当时还不算老，也许因这缘故，大学者没有把此事列入他所痛恨的“不要脸”之列。

照老上海规矩，凡属江湖作为的事最好不要“穿帮”。但我现在，却唯恐其不“穿帮”，因为讲这类经历会给我这老年人带来愉悦，也许也能让年轻朋友开开眼界。远在台湾的杨渡先生十多年前闻说我的种种，赠我一诗，末句谓：“幸有老眼不昏花，趁早轻狂学嬉皮。”“嬉皮”之事，当然都属江湖之列。杨兄真是知我哉！但是说来归去，今天能把种种江湖都“穿帮”，更令老汉高兴。我希望俞兄再多写些，尽量把这个“出版江湖”都弄“穿帮”，可以“知它”，也可以“罪它”，总之让它为更多的人所了解。

2013年中秋节，鄙人82周岁生日

目 录

i 序言：“穿帮”的愉悦

- 1 那一张旧书单
- 23 新老年沈昌文
- 28 天上的馅饼
- 33 陈昕印象
- 41 出版：西方启蒙运动的发动机
- 49 大师的纠结
- 56 书香忆，最忆是董桥
- 62 董书的迷恋
- 70 迷失在读书日
- 74 读之初

78	感恩幾米
82	皇帝的新衣
86	美因河畔的梧桐树叶第十次黄了
92	删改的艺术
98	身段最低的出版家
102	朝阳之美，还是落日之美？
105	找寻传统与个性的记忆
108	淘民国童书杂记
114	西方人如何看待孔子
120	心中的刘杲
130	DK，死在营销王手上
139	一百年，四六开
144	阅读的前生今世
156	在那里，我们发现了什么？
166	周振甫：一篇文章和一封来信
174	后记

那一张旧书单

找寻出版的关键词

从事出版业久了，脑中塞满千奇百怪的东西，有一种乱糟糟的感觉。自我解嘲，所以才是“杂家”么。心里却想，这样的行业，出人才难，出钱财难，让人尊重都很难。学识，商业，见识，修养……都不见出类拔萃之处。杂就杂了，哪里够得上“家”呢？说归说，我还是很爱出版行业的。也是无奈，三十年过去，不爱都来不及了。

我有时深夜无眠，常用的办法是找一个喜爱的词汇，反复默念，比如阅读、阅读、阅读……郊游、郊游、郊游……迷离之中，书香四溢，绿草如茵，大脑的紧张得到缓释，就睡去了。那天又出现失眠的状况，想一个词汇吧，哪一个令我青睐的出版关键词，反复诵读，能让我轻松下来，安然睡去？

作者——难啊，比找金子还难；好书——难啊，比找银子还难；畅销——更难了，连上帝都没有办法……我越想越精神，干脆坐起来不睡了，这样的难题，几宿也想不明白！那些前辈是如何做得好、卖得好、睡得好的呢？读吧：张元济、陆费逵、王云五、陈原、沈昌文……这些让我叨念不已的名字，我该怎么做，才能够接续他们的理想？我该怎样做，才能够有一个安稳的睡眠？想着想着，终于，我找到一个让我安静下来的关键词：书单、书单、书单……

此时，我的呼吸均匀了。我甚至套用起那句名言：“书单是个纲，纲举目张。”喃喃自语，就有了昏昏睡意。睡梦中，中国百年出版，一张张让人感奋的书单纷纷飘来，像春露，像暖阳，像微风，像瑞雪……没有它们，何谈出版？有了它们，出版才有了意义，我们才有了编书的依据。

书单的界定

此处“书单”，是指人们为了选书而开列的书目。由于选书的目的不同，书单又有“读者书单”与“编者书单”之分。一般说来，前者的目的是为自己阅读所用；后者却是为别人阅读提供可以选择的书目。所以后者的含义更复杂、更丰富，它集文化、商业、投资、个人好恶、群体热点等多重因素于一体，具有很强的预判性与风险性。出版人终日忙忙碌碌，都在忙什么？条分缕析，就是在找寻那一张所谓好书单——可以承载文化的书单，可以让读者喜欢的书单，可以热卖的书单。

其实编者的书单，或曰出版人的书单，还未成“书”，它更应该被称为“选题单”。它的提出大约有两个来源：一是来自专家的推荐，它更注重文化的纵向分析；二是来自出版方的判断，它更注重文化的横向比较。纵横交错，最终构成选题的出版依据。

本文记录的“书单故事”，有对出版者产生影响的读者书单，但是主要在“选题单”。其中有些例子选自我的读书笔记，有些例子选自我的工作日记。我觉得，以本文的题目为发端，我们可以编一本很好看、很实用的书，使阅读者产生更多的遐想，去选书，去

读书，去编书，去做书……

光绪皇帝的书单

戊戌变法前，张元济先生在总理衙门供职。他说光绪皇帝喜欢读“新书”，经常通过总署转来书单，让他采购。所谓“新书”，主要是一些译介西方文化的著作。但那时此类书很难买到，张先生四处借阅，还把自己的书拿出来，呈送给光绪皇帝。百日维新期间，光绪皇帝曾经在同一日分别召见康有为与张元济二位。张先生回忆，光绪皇帝对他说过一句话：“外交事关紧要，翻译必须讲求。”没想到，这一些经历竟然成为张先生后来一生所为的伏笔。

南洋公学译书院的书单

一八九八年十一月，戊戌变法的血迹尚未干涸。张元济先生带着朝廷“革职永不叙用”的大辱，离开京城，来到上海。经李鸿章举荐，出任刚刚组建的南洋公学译书院院长。他到任时，书院已经出版八种译自日文版的兵书《日本军政要略》、《战术学》、《军队内务》和《作战粮食给予法》等。这是一张实用主义的书单，张先生建议改弦易张，开拓更宽的译书领域。

他开出的第一张书单是请严复先生译亚当·斯密《原富》，他建议为严复先生支付百分之二十的版税，这也是中国最早实行版税制的实例之一。为此，译书院出资两千银元，几乎是译

书院当年百分之二十的开销。到一九〇四年离开译书院，加盟商务印书馆之前，张先生主持译书院开出书目六十七种，正式出版不少于三十六种，有《中等格致读本》、《政群源流考》、《万国通商史》、《英国文明史》、《美国宪法史》和《万国政治史》等。

严复的译书单

据严复先生书札记载，在张元济先生主持译书院期间，曾经多次与严先生讨论翻译的事情。一八九九年，严先生在给张先生的回信中写道：“（张元济问）门类以政治、法律、理财、商务为断，选书最难，有何善策？”对此严先生作了认真回复，这些都成为后来张先生进入商务印书馆，组织出版“严译名著丛刊”的基础。

严译最重要的书单，包括八部著作：亚当·斯密《原富》、赫胥黎《天演论》、斯宾塞《群学肆言》（即《社会学研究》）、穆勒《论自由》和《逻辑学系》、甄克思《社会学史》、孟德斯鸠《论法》和杰方斯《形式逻辑》。

张元济的国学书单

可能是受命光绪的知遇之恩，也可能是出于对中华民族自省力的失望，张先生极为重视西学引进，支持严复、林纾一类翻译家的译著出版，构成“百年商务”译书传统。但张先生真正的看家学识，却在国学。他曾经与王云五先生聊天时说：“余平素对版本学

不愿以第二人自居。”张先生整理国故，最有名的三件大事：其一访书，为此“求之坊肆，丐之藏家，近走两京，远驰域外”。其二建涵芬楼暨东方图书馆，收书几十万册，仅善本就有三万五千余册。一九三二年日军轰炸上海，使之化为灰烬。张先生曾经悲愤地叹道：“这也可算作是我的罪过，如果我不将这些书搜购起来，集中保存在图书馆中，让它们散存在全国各地，岂不可避免这场浩劫。”其三是他的古籍整理与出版工作。最有名的“四大工程”，包括《四部丛刊》、《续古逸丛书》、《百衲本二十四史》和《丛书集成》。后人对此项工作评价极高，说它们可与《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媲美。周汝昌赞扬他“一人之力，可以抵国”。

王云五的大书单

王云五先生早年读原版《大英百科全书》，边学英文，边学知识。受此影响，他也成为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尤其擅长遴选、分类图书目录。他发明“四角号码词典”和“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即是明证。

王先生开书单，堪称“世界第一书狂”。上世纪三十年代，他组织“万有文库”，在几年的时间里，推出两集四千多种图书，数目之大，被当时的《纽约时报》称为“世界上最大规模、最具野心的文库”，称赞他“为苦难的中国提供书本，而非子弹”。商务印书馆“日出一书”的方针，也是王先生提出来的。

遍览王云五先生为商务印书馆开列的大批书单，最让我敬佩的是“中国文化史丛书”。此丛书拟出版八十种，实出四十一一种，有

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陈登原《中国田赋史》、陈邦贤《中国医学史》、姚明达《中国目录学史》、邓云特（邓拓）《中国救荒史》、顾颉刚《中国疆域沿革史》、胡朴安《中国文字史》和《中国训诂学史》、王庸《中国地理学史》、李长傅《中国殖民史》、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陈东原《中国生活史》、陈顾远《中国婚姻史》、李俨《中国算学史》和白寿彝《中国交通史》等。直到今天，这些书还在再版，还是某些学科领域的必读书或里程碑。

由此想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李一氓先生提出：“古籍的整理工作最终结果应有一个归纳，就是要总结出一部有关学科的概论来，这种整理方法就是研究……研究也是整理，并且是很重要的整理方法”。他划分出文学、哲学、经济、艺术等十个门类，包括四十三本书目：《中国文学史》、《中国音乐史》、《中国绘画史》、《中国小说史》、《中国佛教思想史》，等等。他深情地说：“假如有一天这四十来种研究著作都出版了，我们的古籍整理的局面将大为改观。”以此与上世纪三十年代王云五先生的工作比照，似乎“英雄所见略同”，但“顶天立地式”的大学者，却再难像王先生那样，聚合得那样整齐。

胡适的小书单

一九二一年，商务印书馆聘请胡适先生出任编译所所长。为此将胡先生从北京请到上海，考察一个半月。胡先生最终没有接受邀请，他在日记中，一方面赞扬“这个编译所确是很要紧的一个教育机关——一种教育大势力”；一方面写道：“我是三十岁的人，不

应该放弃自己的事，去办那完全为人的事。”但是，他很喜欢上海的人文环境，他临行前还写了一首诗，表达对商务印书馆的感谢，以及对上海的依恋：“多谢主人，我去了！两天之后，满身又是北京的尘土了！”

在沪期间，胡适先生向张元济先生提出编印“常识小丛书”计划，此事见于他的日记：“下午到编译所，为他们拟了一个《常识小丛书》的计划，并拟了二十五个题目。”这张书单包括国家五个：《日本》、《英国》、《美国》、《俄国》和《德国》；历史巨人四个：《孔子》、《释迦牟尼》、《耶稣》和《华盛顿》；新事物五项：《交易所》、《银行》、《飞机》、《电报》和《无线电报》；主义一项：《过激主义》；政法四项：《法律》、《国会》、《律师》和《法庭》；经济重点六项：《盐》、《蚕》、《蜂》、《棉》、《茶》和《煤》。

需要指出，上面这张书单是张元济先生改过的，他去掉了胡适先生原书单中的《袁世凯》，建议加上《布尔什维克》或《过激主义》；去掉了《电话》，建议加上《煤》或《煤油》。

张元济请陈独秀开书单

一九一八年，张元济先生应蔡元培先生之邀，赴北京大学座谈。其间与陈独秀先生有一段对话，意为请陈独秀先生主持，开一套“通俗教育”书单。张先生的日记中，记载了他们的对话：“陈：合同所限字数，每册不得过十五万字，恐难免逾越。张：合同本有彼此协商之语，希望出书价格稍廉，易于推销，免阻编译诸君之兴。陈：每书另订契约一节，不甚明白，是否谓本约已满，而每书之专约仍

有效。张：甚是。陈：每种若干？张：约五百部。”

一九二一年九月，陈独秀先生抵沪，出任中共中央书记。张元济先生闻讯后，请沈雁冰先生面见陈先生，以每月六百元高薪聘他进编译馆。陈先生以太忙推辞，仍任馆外名誉编辑，月薪三百元即可。张先生接受了他的意见，只要他每年写一本小册子，题目自定。

梁启超为商务印书馆开的书单

一九二〇年，梁启超先生从欧洲回沪，为张元济、高梦旦开了一个大书单，即后来出版的“共学社丛书”。他确定原则：“须将世界学说无限制地尽量输入，斯固然矣；然必所输入者确为该思想本来面目，又必具其调理本末，始能供国人切实研究之资；此其事非多数人专门分担不能。”梁先生还为他的书单提出口号：“培养新人才，宣传新文化，开拓新政治。”为此，张元济先生预付给梁先生稿费二万元。两年出书几十种，包括考茨基《马克思经济学说》、罗素《算理哲学》和爱因斯坦《相对论浅说》等。

张先生还资助梁启超先生请西人来华讲学，拟每年由商务印书馆拨款五千元。有名的罗素先生来华讲学，赵元任翻译，就是用的此项资助。

胡乔木为“汉译名著”开的书单

一九八二年，为纪念商务印书馆创立八十五周年，编印“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第一辑五十种。陈原先生派人送给胡乔木先生一套。一年后，胡先生见到陈先生，谈到这套书，说了一些很具体

的编写意见。陈原先生将谈话内容整理出来，送给胡先生看。胡先生改后返回，遂成一“书单”。

——古典名著，世有定评，为数不多，应尽量把内容重要而未译出者列入规划；（他谈话时列举的例子是希腊罗马的名著，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普鲁达克。他说已译出的校订译文，尽量能精确表达原意；他说这方面作出选择不难，因为评论多。）

——从文艺复兴到十月革命这个时期（主要为十八、十九世纪）的著作，品种较多，宜选译学术性较强，对当时社会发展起过作用的著作，也可选译一些学术性虽不强，但资料丰富的著作；（他列了一串十八、十九世纪资本主义上升期辈出的西方哲人，他说这个名单和著作比古典时期多多了，所以要精心选译；他说起过作用的是指起过积极作用的，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并且举了几部书的例子，大都是被目为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的若干名著。）

——本世纪（二十世纪）西方和日本（东方）各派学术著作，为数更多，选译更要着重学术性；其中一些在政治上对我极为不利的著作，如确要译，不要列入名著，并应考虑发行方式；其中有些可出单行本，也要考虑发行问题，不列入名著；（谈话时他特别提出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政治小说《一九八四》，此书早年出版（一九四九年初版，一九七七年重印）时没有引起轰动，但到了八十年代，西方世界起了一股热潮，评介研究这部“小说”。他说这部书很反动，彻头彻尾反共的，作为知己知彼用，可以译出，但绝不能让它到处传播。）

——要注意选译一些大学问家的主要代表作品；（如罗素的书

译出不少，还应译出他的三卷本《数学原理》。)

——要注意选译一些经典型的通俗科学著作，特别是大专家写的通俗著作（例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浅说》）。（陈先生写道：“这条是我写信时加上去的，想借此请教他；他对这一条特别注了几行字：‘该书只讲狭义相对论，且因……（我在初中时即读了），可出版，但似不宜列入名著。’”）

葛兆光等为“国学丛书”开书单

一九八九年底，辽宁教育出版社“国学丛书”树帜。我为这套书专门成立一个编辑部，请来三位高人：葛兆光、王炎和冯统一先生，请他们帮助选书。他们首先撰写“编辑旨趣”：“华夏学术向以博大精深著称于世。降及近代，国家民族多难，祖国学术文化得以一脉未坠，全赖有学见之前辈学人参酌新知，发奋研治。‘国学丛书’愿承继前贤未竟志业，融汇近代以降国学研究成果，以深入浅出形式，介绍国学基础知识，展现传统学术固有风貌及其在当代世界学术中之价值意义，期以成为高层次普及读物。”他们开出的第一批书单包括：《国学今论》、《天学真原》、《讖纬论略》、《岐黄医道》、《汉字说略》和《宋明理学》等。还有几本书，当时作者未能写出，包括《佛典常谈》（陈世强）和《旧学新知》（陈平原、夏晓虹）、《载道以外的文字》（钟叔河）。

记得一九九五年，葛兆光先生与我讨论“国学丛书”的后续作品，他提出一些冷僻的题目，诸如《中国历代植物志研究》、《四裔志书研究》、《近代乡绅与城市地主的互动》和《近代中国民间信仰